

移民岁月 第二十六期  
YI MIN SUI YUE

# 上海文教大队支宁老师李文元 (三)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三组

据王守业讲：因上海支宁教师来人数较多，又赶上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各地来人数较多，银川根本无法安置几百人的队伍。从上海出发前就与家里商定，到银川后马上转移到条件较好的吴忠市先安置，由于衔接不到位，又没及时向这批人说清楚，后来绝大多数教师都有了怕他们捣乱的误解。其实宁夏文教厅对这批教师很欢迎，根本没在政治上设防。

李文元：几车人都被转到吴忠一个招待所，转移过程中我们的心理阴影更大了。五六天后一批未戴帽子的人分配当了老师。一个月左右，我们又被接回银川，参加修建银新公路。让我们回到讲台的承诺没有马上兑现。

参加修银新公路时间不长，大概两三个月，季节已到了冬天，很冷，工作条件也差，粮食根本不够吃。父母亲在上海的定量也很低，但还要省些粮票寄给我。修银新公路时我在宁夏过了第一个春节，是1959年2月8日。放假了，所有的人都趴在篷里写信，不敢把心里的苦和生活中的苦告诉家人，怕他们担心。

本来我们是满怀再上讲台的信心踏上了西行的火车，但到了宁夏，先是修路，与教育无缘。随后又把我分配到永宁县掌政公社，下放劳动。还与教育无缘，跟着公社的社员一起去

挖西干渠。1959年的冬天特别冷，从上海来根本适应不了这里的寒冷，腿冻出了毛病，加上吃不饱饭，腿浮肿得比水桶还粗，又怕别人说偷懒，病了也不敢请假，咬牙坚持。

住的是地窝子，人拉肩扛，背背篓，用铁锹挖冰冻的泥土，全是拼体力。早晨7点上工，一大碗稀饭，中午没饭，干活到晚上，还是一碗稀饭。人饿得没有一点力气，走路都打摆子，有个别身体差的走在路上就倒下了，让人抬回去。

有一段时间我病得很重，又不敢给别人讲，天天咬牙坚持，脚肿得穿鞋都很吃力。

一天早晨实在坚持不住了，起床的力气都没有，队里的一位老贫农发现我没起来吃早饭，就到地窝子里看我。他说你病得这么重，为什么不去看？那问话是我来宁夏后听到的最温暖的时候，眼泪马上控制不住地往下流。这位老贫农默默地看着我流泪，转身到伙房给我端了一碗热呼呼的稀饭，劝我先吃给我。我是一边流泪一边把稀饭喝了。饭后他要送我去看病，还给队长讲，李文元病得很重，不能上工了。因为老贫农的请求，队长也同意我休息了几天。

我至今都特别感激那位老贫农，始终记得那张憨厚的脸和给我端来稀饭的粗大双手，一生忘不掉他。因为戴着

右派帽子，不能随便跟别人讲话，也没敢打听他的姓名，无法报答，这件事情让我后悔终生。修西干渠是一段很艰难的日子，有些人没挺下来。

1960年5月，县上重新把我们集中起来学习。永宁县的领导很不错，对我们比较宽松。但9月份又开始了“双反”运动，每天都要抓出一个人来批斗，有些人挨批斗的原因现在听来都觉得莫名其妙。

有个从上海来的老师烟瘾很大，买不到香烟，就去街上捡别人丢掉的烟头。后来被安上了抹黑社会主义的罪名，判了刑。

我受冲击不是很大，还保留了公职，对农业冲击也开始适应了。由于表现好，到1961年4月，永宁县把我的工作分配到养和完小。

我是以教师身份参加支宁的，经过两年的折腾，又当起了教师。但心理上的阴影还是很大，右派的身份压得人始终无法放开手脚工作。政治上抬不起头，低人一等。任何事情不敢发表意见，只是埋头工作。

来宁夏后有两件事情让我特别开心，一件是宁夏人的纯朴和善良，另一件事是上级领导对我教学质量的肯定和信任。所以后来有机会回上海，我都放弃了。从心底讲，我喜欢上了宁夏，感觉这里的民风纯朴，人民善良。

文革时期上海来的老师很多都受到了冲击，但没有冲击我，一张大字报都没有，只是受到了冷落，当地人对待的老师还是手下留情。

1966年查出身体不好，医生开的证明是，如果文革中没有问题，建议休息。我当时带着两个班的课，校长听说后，直接批准我休息，对我很关心。

1968年把我们几个右派老师送去劳动，到街上去拉肥料，当时右派都戴白袖章，很伤人自尊的，不想戴也得戴，只好把白袖章戴在里边的衣服上。后来被监管人员发现了，大声地训斥我们。社员看到后就起哄，把看管我们的那个队长赶跑了。跟社员一起劳动时，他们根本不管我们戴不戴白袖章，还跟我们嘻嘻哈哈的，让我们很放松，有了些自尊。

这么多年来，自尊心始终在支撑着我。四清前在学校要带两门课，学校把我当成教育积极分子，还当了班主任，既教语文，又教数学。教出的孩子和家长们都说李文元老师好，这是我最满意的。

我坚信母亲讲的那句话：“中央最终会给我们平反的”。我能做的就是用勤勤恳恳的工作证明我是清白的人，用家长、学生、同事对我的尊重来证明我是个有用的人。

(王旭阳 蔺根生 整理)

# 宁夏考古事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牛达生 (四)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三组

据以前考古调查资料显示，倒塌的方形古塔的塔高是十一层。开始发掘时大家都有意想找到塔基座后再往下挖，因为一般的古塔中都会有地宫，想着看地宫里能不能发现些有价值的东西，但在向下挖掘过程中，没有找到预想的地宫，反倒是发现这座古塔不是原来资料上显示的十一层，而是十三层。十三层高大建筑全部建在巨大的石基上，石头与砖块之间用黄泥浆勾缝，由于古塔建筑位置在沟道中，每年的洪水都会带下大量的泥石，经古塔的拦截后形成泥土和石块的堆积，遮挡了最下边的两层，又因为时间太久，新堆积下来的泥石板结成坚硬的表层，给人以误导，以为在堆积泥土上只有十一层。另外一个惊人的发现是找到了大量的西夏时期印制品，其中的很多文字存留特别有文物价值，这些文字不仅揭开了古塔的建筑年代秘密，还通过残存的文字信息向后人讲述了很多历史文明发展的轨迹。

牛达生：在现场考察中，我们发现了墨书汉文和西夏文题记的塔心柱。汉文题记就是建这座塔时记载下来的愿文，是建造者心愿。残留的部分文字

为：“特发心愿，重修塔一座，并盖佛殿，缠塑塑像佛像，到四月一日立塔心柱，奉为皇帝皇后万岁，重臣千秋，风调雨顺，万民乐业……”这段文字证明，古塔是西夏时期所建，而且是与皇族有关的建筑。后来又是在塔心柱残片模糊的字迹中，辨认出“大白高国大安二年”等字样，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大白高国”，即西夏国名，“大安”是西夏第三代皇帝秉常的年号，“二年”，即公元1075年。这是个确切的建筑始建纪年，是目前所知西夏古塔中唯一有具体纪年的高层佛塔。这座古塔距离现在已经920多年。在这么长的历史空间里，历经了兵荒马乱的战火、地震的破坏，还有风雨的侵蚀，仍然保留到被炸毁前，十分难得也十分罕见。

我们的考古工作绝不是为了发古人的之幽思或去发古人的财，那只是满足了人们某种感情的需要和财产的虚无。考古工作的最终目标是为了通过对历史的发掘和对文物研究，去探究历史，认识历史，寻找历史文明的脉络，我们在发掘古塔的残留时就是通过细致的研究，把住了这个历史的脉络，在随

后的时间里就是要根据这个脉络，准确的给这段历史做出评定。

1972年，在去北京考察时，我听到一位国家级考古前辈说：“西夏考古很重要，因为在二十四史中没有西夏史的记载，许多历史问题需要通过现在的考古成果来解决，你们宁夏应承担起研究西夏的责任。”今天看来，这话仍然十分正确。

西夏考古工作因为史料的不足和大量文物流失海外，在全国的考古圈内被称为考古工作中的“绝学”，这也说明了西夏学研究中的地位和艰难程度。那次在古塔废墟中的发掘，在别人的眼中就是一处残破砖瓦的堆积，在我看来，却像是一座珍藏珍宝的宝山，又像是一座神秘的迷宫。当时我们像着了魔一样每天挖，就是要挖开这座宝山，揭开迷官。

当时，我已经50多岁了，每天都坚持在发掘和清理现场。最后证明，我们的发掘工作很成功，有了西夏考古中的一次重大发现。我们在发掘和整理现场过程中还发现，在遗址地表，砖瓦建筑材料随处可见，有的地段还暴露出铺

有地方砖。现场采集到的瓦当、滴水和脊兽残件中，还有部件是绿琉璃和蓝琉璃的。这些琉璃构件，釉色光亮，质地良好，制作精细。查阅《西夏法典》时发现，在那个年代有个规定：除寺庙、皇宫外，官、民宅第“不准装饰莲花瓣图案，禁止用红、蓝、绿等色琉璃瓦作房盖”。这些情况都表明，在西夏时期，这座古塔的建筑规模很大，建筑规格很高。

发掘时间历经两个多月，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沟道里乱石荒滩，根本无法搭建帐篷，又是夏季，随时可能会有洪水的袭击，只能在一处倒塌的山洞顶上，支上立柱，再盖上防雨布当房间，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水，运水也要靠驴，有时天气不好或驴过于劳累，驴脾气就会来，拒绝进山。发掘现场就会断水半天或一天，牛达生在时刻关注发掘现场能否出情况的同时，还要担心大家的身体和安全，既要当好领导和专家，还要当好后勤的管家和“妈妈”。

至今他也没有把那次艰难的考古中取得的收获和成绩全归自己，时时会想起与他一起克服困难的团队。

(李习文 蔺根生 马君武 整理)

# 小麦育种专家——裘志新 (四)

宁夏政协移民资料征集三组



裘志新在检查麦穗生长情况。(图片由本人提供)

裘志新：尽管宁夏比杭州差的很远，干农活很辛苦，气候条件也差，但宁夏的党政领导和农民都很有胸怀，除了参军这个要政审外，其他方面没有让我们有一点点被歧视的感觉。身份问题在杭州会让人心里有很大的落差感，但在宁夏那种落差感没有了，反而感受到了很多的尊重，找到了平等感。这也是我后来特别喜欢宁夏的一个重要原因，裘志新所说的宁夏胸怀，成就了他成为后来的小麦育种专家。

1972年，裘志新到永宁插队已经有了七个年头，这七年来，他先是跟着队上的妇女后边起步，后来还成为队上的壮劳力，工分也按壮劳力记。七年来，他从杭州一个小资本家的儿子变成了生产队的团支部书记。这七

年里，他还收获了爱情，胜利大队的姑娘李凤香和她的父母都很喜欢读过书的这个杭州人，经常喊他到家里吃饭，队干部和社员也都撮合他们，1969年裘志新结婚了，当时永宁县还宣传了他扎根农村的消息。

这七年里，这个资本家的儿子还被评为五好社员，政治思想好、劳动好、热爱集体好、勤俭持家好、团结友爱好是五好社员的标准。七年里，他又和同来的杭州青年一起，把南方的插秧技术引到了胜利公社。队上的水稻田产量从200多公斤提高到470多公斤，产量翻了一番；七年里，他喜欢钻研技术，加上当地干部宽广的胸怀给裘志新的人生带来了一次质的转变。1972年他当上了胜利公社脱产农民技术员，从每天靠劳动挣工分到每月按照领工资，30多块钱的收入在当时可以排到中等水平。

永宁县有个良种繁育场，只有四个编制，负责全县小麦良种的繁育，老场长最头痛的事就是留不住人，来的大学生最多三五年就会另谋高就。

为了扭转留不住人的被动，后来招人时就从公社的农业技术员中选拔。

裘志新：接到让我到良种繁育场当技术员的通知那天，我正在大队的积粪队劳动，跟我一起积肥的几个农民还高兴的起哄，让我请客。实际上我知道，我又要从头学起。报到后的第一年领导派给我的任务是小麦良种的繁育，算是一头扎到了农业科技领域，没想到的是这一头扎进去就是40

年。其实在我们之前宁夏已经在小麦育种方面有很多专家，而且育出了很多有影响的小麦新品种，我们的研究是在那些前辈的成果上起步，能够取得特别明显的成果，应该讲是基础好、起点高、弯路少。

有了这样良好的基础，裘志新的勤奋与努力再加上老一辈育种专家时不时的拉一把，裘志新培育出了享誉西北、华北的“永春四号”小麦新品种，后被命名为“宁春四号”，再后来又有了“宁春系列”小麦新品种。20多年的时间增产数十亿公斤。

小麦育种最大的难题是周期长，一个小麦新品种的培育至少需要十几代的改良和物种进化。宁夏无霜期短，再加上夏季高温，只适合一季小麦的生长，为了克服季节制约，加快新品种培育，裘志新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奔波中国南北两地的小麦育种工作，春季在宁夏播种，收获籽种后立即奔赴云南再租地复种，云南收获后再奔赴海南租地，再收一季后，来年再开这样的往复。就这样，把一年当成三年用，育种圈内称他为“追赶太阳的人”。

裘志新：要说追赶太阳也不容易，因为异地租种土地的困难很多，不仅有生活上的困难，还有气候、温度、生长适应性和经费等一大堆问题。我们在租种第二年就遇到了云南的大旱，那次租种了一亩地，下种后小麦刚刚出苗，就遇到了云南40年未有的干旱年份，刚出苗的小麦让太阳打蔫，再不浇水的活

麦苗将保不住了。如果这些麦苗死掉了，我们前两年的育种工作就白忙了，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在这之前的两年时间里，我们培育的品种已经有了良好的品质表现，那时候最怕前期的工作付之东流。我和另外一个同志一起商量，一定要保住这些麦苗不被旱死。我们就向周边去找水，云南的水塘也多，距离租种地有将近500米的地方找到一个水塘，借了两副水桶和扁担，天天挑水浇地，20多天，来来回回的挑水浇地。

后来有几天，当地租给我们地的农民也被感动。从我们开始挑水浇地的第五天开始，他主动跟我们讲，每天免费给送两顿饭，饭送来后我们吃，他这个农民就利用吃饭的间隙，帮我们去水塘里挑几趟水。就这样靠挑水，保住了育种成果。

在常人理解，小麦育种是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但裘志新说，小麦育种最重要的是选对植物父本和母本，再将父本母本中的优秀基因进行催生，让优秀的基因变成稳定的品性。追赶太阳只是为了缩短育种时间。在实际工作中，还有很多根本没有一点技术含量的工作要做，比如对付地下的老鼠和空中的麻雀。在云南育种时，撒鼠药、下鼠夹是最常见的事，有一年租来的一亩地下了近百个老鼠夹，每走一步都会有一个老鼠夹，把育种田全部包围起来啦。在驱赶麻雀时，还遇到当地动物保护组织的指责。(蔺根生 整理)

# 斯诺 海德姆 对西征红军的采访与宣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长征和西征，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引起了埃德加·斯诺、乔治·海德姆(中文名马海德)等国际友人的深切关注。他们目睹了中国人民在苦难深渊中挣扎的情景，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在红军西征期间，他们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西征战役的主要战场——宁夏豫旺、固原地区进行采访、开展医疗救援活动。

豫旺堡是西方野战军总部和红一军团司令部所在地，斯诺和海德姆在此受到西方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和红一军团首长的热烈欢迎。1936年8月22日，西方野战军总部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彭德怀、左权、聂荣臻、朱瑞、李富春、刘晓等领导及各师团代表和驻豫旺堡连以上干部。彭德怀和斯诺在欢迎会上讲了话。斯诺高兴地说：“你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拥护你们。我这次要把你们几年来艰苦奋斗的经过，告诉全世界无产阶级知道，最后你们应努力用中国的革命模范来推动和领导全世界革命。”演讲结束时，他又激动地高呼：“中国革命万岁！”“红军胜利万岁！”“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斯诺的讲话大家虽听不懂，要由黄华进行翻译，但同样受到与会红军将领热烈地鼓掌欢迎。事后，驻豫旺堡杨家堡子的红军把斯诺的演讲稿摘要用毛笔写在一所民房墙壁上，一直保留到20世纪60年代。

斯诺、海德姆以极大的热情，深入西征部队，发挥各自的专长，积极为广大指战员服务。斯诺以新闻工作者的职业习惯，每到一地，顾不得休息就立即进行紧张的采访。海德姆每到一地，深入红军驻地了解部队的医疗卫生状况，受到红军和回族群众的真诚欢迎。海德姆在西征前线一边陪同斯诺采访，一边给当地红军和回族群众治病，当地回族群众对他非常友好，这使他很受感动。海德姆发现回族群众姓马的多，为了更好地同群众相处，便决定在自己的原名海德姆前面加上马姓，改名为“马海德”。

在豫旺堡，斯诺和海德姆与彭德怀同住西方野战军总部院子里，彭德怀给他们介绍了红军的生活情况、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统一战线政策等等。彭德怀还带着斯诺一起参加红军的政治会议，访问红军连队，观看红军战士剧社的演出，给斯诺的采访提供了许多方便。红二师政委肖华曾为他安排了详细的访问日程，使他到红军丰富多彩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斯诺对红军“每一个连和每一个团都有列宁室”感到新奇，在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晓陪同下，他到一个列宁室去参观上政治课，对红军的生活作了进一步观察。

1936年8月26日，斯诺在豫旺堡采访10天左右后，应徐海东邀请，前往驻下马关的红十五军团采访。8月27日，斯诺与徐海东长谈了一整天，对徐海东的个人经历非常感兴趣，在《西行漫记》中专门写了一章《红色窑工徐海东》。8月底，斯诺专程到固原七营进行了采访，会见了邓小平。

海德姆全心全意为驻地群众和战士服务。有一次，一位红军战士被毒蛇咬伤，海德姆毫不犹豫地用嘴对着伤口把毒液吸出，而后敷药包扎，使病员脱离危险。他以满腔的热情一边紧张地诊疗治病，一边做调查研究，还到红军各卫生医疗单位了解情况，掌握大量材料。在与西征前线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接触中颇有感受，回到保安后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关于改进苏区卫生状况的调查报告，毛泽东非常欣赏。不久，海德姆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顾问。1937年2月，海德姆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海德姆加入中国国籍。(据固原党史网)

# 红军长征青石嘴战斗纪念碑

1935年10月6日，中央红军陕甘支队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中央领导的率领下，经西吉县兴隆镇、单家集到达张易堡(现张易镇)，夜晚，毛泽东就住在张易毛庄村。10月7日晨，红军与尾随而至的敌前哨部队发生小规模战斗，留下部分战士在堡子梁阻击敌人，大部队沿王寨、后莲花沟向六盘山急进。在红军前卫部队翻过六盘山行进到青石嘴附近时，抓到敌人的便衣侦查员，经审问，得知国民党东北军骑兵第7师19团两个运送给养的连队刚到青石嘴休息。毛泽东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召集会议，下达作战命令。王开湘、杨成武率领4大队担任正面攻击；杨得志、萧华的1大队和张春山、赖传珠的5大队分别从两侧迂回，陈庚、邓飞率13大队后卫掩护。这时，敌人正在吃饭，一时枪声大作，乱作一团，在钳形包围下成了瓮中之鳖。整个战斗持续约半个小时，共歼敌200多人，缴获战马100多匹以及10余辆马车的弹药物资。红军用缴获的战马组建了骑兵侦察连，任命梁兴初为连长，刘云彪为副连长。

为了纪念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2008年7月，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建设了红军长征青石嘴战斗纪念碑。纪念碑占地面积4800平方米，纪念碑主体高19.35米，碑体两侧翼高10米，碑名高7米，象征1935年10月7日红军长征青石嘴战斗日期。2009年命名为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据宁夏党史教育网)

# 党在固原的基层组织建设

1938年，国民党顽固派实行“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反动政策，撕毁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协议，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妄图消灭日趋壮大的抗日根据地和武装力量。在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反动派侵占了固原等大片地区，破坏了党领导的一些地方政权和工会、青年、妇女以及自卫队等群众组织，纠集反动民团、土匪和特委，在边区境内进行抓人、抢掠、烧杀等破坏活动。

国民党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国民党第三专区专员钟竟城将土匪头子赵老五委任为环县县长兼保安大队长，组织并武装了300余名匪徒，侵占了边区环县的甜水堡和固原东部地区，经常出来骚扰破坏、奸淫掳掠，多次袭击我区、县党政机关。固原县民团团总卢业广、卢建祥父子 and 区长王慎之、乡长安文明等也经常利用夜间偷袭边区，抢掠财物，煽动自卫队叛乱，三岔区干部苟惠民等14人惨遭杀害，马渠、草庙、车庄、石家沟口、郭家堡子等地的抗日救国会无法工作。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党中央、毛泽东明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策口号，制定了反对磨擦的斗争方针和自卫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此方针指导下，固原地下党组织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斗争。(据固原党史网)